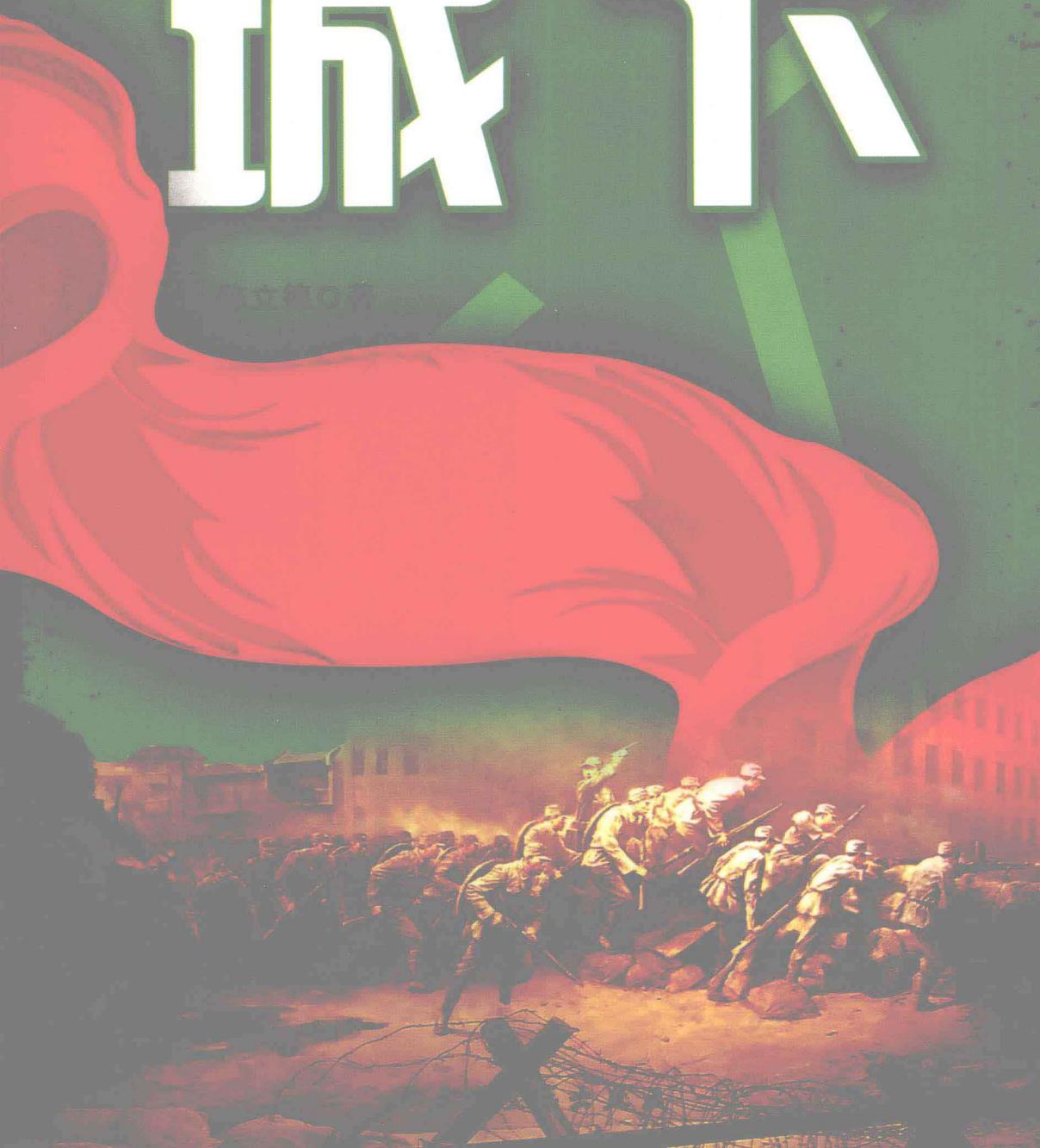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四面红旗话军事

ZHHONGGUO  
XIANDAI JUNSHI  
WENXUE CONGSHU

# 城下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第一辑:国内革命战争)

# 城 下

陈立德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下/陈立德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5 (2009.1修订)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国内革命战争/黎白主编)

ISBN 978-7-80171-300-1

I. 城…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5162 号

**城 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7 字数 597 千字

2009 年 1 月修订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71-300-1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 内容简介

《城下》是深受读者欢迎的长篇《前躯》的续集，反映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同北洋军阀吴佩孚所进行的三次惊心动魄的大战役，最终实现了“直捣武昌，饮马长江”的战略目标。

小说歌颂了叶挺为首的独立团官兵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真实生动地再现了蒋介石、吴佩孚、唐生智、刘玉春等历史人物在这场大搏斗中的角逐；揭示了社会上各种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同时还描写了青年人美好动人的爱情生活。

作者勾画出风起云涌的时代风貌，刻画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全书气势磅礴，情节跌宕起伏，既有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又有缱绻柔情。

当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第十师、十二师和独立团取得了平江大捷的胜利之后，北洋军阀吴佩孚在湖南部署的汨罗江防线就全部发生了动摇。受吴佩孚委任的湘军总司令叶开鑫的主力早已沿粤汉铁路退往岳州；国民革命军的第七军和第八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湖南省城长沙，担任前锋的部队也都抵达了汨罗江一线。第四军在攻占平江后，只是很快打扫了战场，安顿了伤号，并未驻下休整，便又以独立团为前锋，向湘鄂边境交界的幕阜山区进军了。虽然指挥官们知道幕阜山是从湖南通向湖北的最后一道也是最险峻的一道屏障，但是吴佩孚没有料到他所倚重的大将陆法会如此地迅速地失守平江，因此对湘鄂边境的幕阜山区并没有调集重兵防守。第四军就是要尽量抢在北洋军的前面，翻越幕阜大山，减少通向武汉的阻力，加速北伐战场的军事进展。

现在，翻开湘鄂两省的地图，只要懂得一些军事知识的人都会看到：除了湘鄂交界的天然屏障幕阜山之外，通向武汉的另一道险峻关隘便是湖北境内的汀泗桥了。这个粤汉铁路上的小车站，距离武昌只有九十多公里，北洋军向这里调集队伍十分方便和迅速。五年前吴大帅就是凭借汀泗桥的天险，挫败了北征的湘军数万之众，稳定了南方的局势，开始了他雄霸中原、控制全国的鼎盛时期。因此，谁都可以料到，吴大帅必将在这里部署重兵，以逸待劳，扭转湖南战事连遭失败的不利局面。

正当吴佩孚向汀泗桥调兵遣将的时候，从广州出发兼程赶往前线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也已经到达了湖南株洲，准备从这里乘火车进驻省城长沙。

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就设立在几节刚刚改装好的头等客车的车厢内。其中一节是蒋介石的办公室：中间安放着一张宽大的办公桌，桌后有一张可以转动的皮圈椅，隔桌另一面也有两张皮垫弹簧靠背椅；他的座位后面高悬着孙中山的遗像和他自己亲手恭录的正楷“总理遗嘱”；两旁靠窗摆着两行沙发，地板上铺着红色的地毯；一边的墙壁上挂满了两广、两湖、河南、福建、江西、浙江、江苏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示着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和进攻态势；另一边窗上挡着白色纱帘，从外面看不清车厢里面的情形。其余的车厢，分别住着参谋处、副官处、机要科、秘书科、警卫团和俄国的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

这列专车就停靠在株洲车站最边沿的一条偏僻的轨道上，四周戒备森严；前面那一节牵引的机车已经升火待发，许多在站台附近露营的士兵都已收拾好了行李和炊具，军官们在车厢外面忙碌地走来走去，都在等候着总司令蒋介石传下“出发”的命令。

这时候，蒋介石刚刚在株洲城里参加了党部为他举行的各界人士欢迎会，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回到自己的专车上。他的机要科长兼私人秘书王亚夫给他送来了厚厚的一叠从前方和后方发给总司令部的文电，这些电报中有前方最新的军事进展，敌情变化，以及后方留守广州的一些文武官员们的动态。本来，蒋介石每天清晨五时起床，六时进早餐，然后第一件事便是浏览批阅经过王亚夫摘选的这些文电，不过今天因为早餐后就到城里参加党部的欢迎会，他才破例把这个日程改变了。屈指算来，他离开广州已有一个多月，由于粤汉铁路从韶关到株洲这一段最艰险的路程还没有修通，他们一个多月来差不多都是乘小木船或轿子在湘粤交界的崇山峻岭中跋涉。沿途的炎热和劳累，使他只是盼望着这艰苦的旅程早日结束，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想前方和后方的事情。到达株洲后，距离前线更近了，这使他对战场形势和敌我双方情况的了解也更清楚了许多；他感到在前线所发生的一切远比他原先所预料的要顺利，就像一个曾经准备倾家荡产、下了大注的赌徒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一样，他对北伐革命的前途变得越来越坚定自信，并且认为这正是他作为最高统帅决策和指挥正确的结果。

蒋介石在军事上当然决不是一个庸才，但过分精明的投机钻营心理和变幻多疑的性格，妨碍他成为一个能作出正确判断并能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去夺取全局胜利的伟大军事家。他虽然在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和日本东京士官学校专门学过军事，但他一生在军事上的成就却远没有政

治上的成就那样显著和得心应手。他虽然没有像一些外国政治家那样进什么专门研究政治的大学深造，但也并非无师自通，这一半得力于他自小受到曾国藩等人的思想熏陶；一半得力于他后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黑社会里的那一段复杂难忘的经历。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蒋介石就正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混合着封建礼教和流氓政治的畸形社会里所造就出来的适应时势的“英雄”，这就是他能平步青云的重要原因。中国古代有一句名言：“为人主者只须善于将将，不必于用兵”，蒋介石这一段成功的道路也证明了这个格言是十分正确的。

在正式誓师北伐，即将离开广州向前线出征的那些天，蒋介石就为了组织总司令部和留守后方的人事部署颇费了一番苦心。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选择一个能干的参谋长和确定留守后方的人选。按照冠冕堂皇的说法，广东是先总理多年苦心经营的革命策源地，如果说得直截了当一些，这个地盘就是一块不能轻易丢掉的肥肉。因此，在他出师北伐以后，把这个地盘交给什么人来留守，就确实是大有学问的。只可惜他自己的嫡系部队还太少，顾得了江浙就顾不了两湖；顾得了前线又顾不了后方。他不禁想起汉高祖刘邦所写的那首《大风歌》来：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是啊，如果他蒋介石手下有一百个像叶挺那样智勇双全而又能像范桐那样俯首贴耳听命于他的将领的话，他又怎会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样的感慨和忧愁呢？他在经过了几天的苦心思索，权衡了种种利弊得失之后，终于最后决定把留守广东的重任，交给粤军第四军的军长李济深。一来是因为他的第四军正在前线担任西部战场的主力，这样的安排会对他的部下是一种激励，使他们在前线更能义无反顾地去奋勇拚命；二来也因为这李济深虽是粤军的军长，但他自己的原籍却是广西，并非广东的地头蛇。将来北伐大功告成之后，当他蒋介石要实行全国江山统一之时，这个人也会比那些有根有底的地头蛇们更容易对付。当蒋介石把这样的安排去征询他的智囊姜仲贤时，那个老谋深算的古董商人也连声赞叹“后生可畏”，认为他现在玩起大手腕来是更加得心应手，圆熟自如了。

蒋介石听了姜仲贤的赞扬后，又更加踌躇满志地笑道：“为了稳住这个家伙，表示对他的信任，我对他说：‘中正此次出师北伐，成功则固然不会再回广州；万一不能成功，也决不再回到广州了。’那家伙听了，两眼笑成一条缝，连忙客气地说：‘北伐成功之日，也即总司令凯旋回粤之时，任潮当率留守后方的文武大员，迎总司令虎驾于百里之外。’娘希匹，他心里只怕就盼我别再回来哩！”

“先给他吃点定心丸，你在前方也免得后顾之忧。”姜仲贤又问道：“还有李福林的第五军，你准备怎么安置他？”

“娘希匹，这家伙也是个拆烂污！”蒋介石不禁又恼火地骂道，“平时他开会从不发言，像个泥胎坐在那里，什么事都唯唯诺诺，可你摸不清他心里在想什么。他的那些队伍都是土匪，一直就驻在河南那边，官匪不分，谁也调不动他。这回也只好让他留守广州算了！”

姜仲贤平心静气地点头道：“这倒也好。李济深留在广州，就得在底下给他安这种不听话的地头蛇。听说河南那块地方，盗匪如毛，还全亏他这种大土匪管小土匪的办法，要不闹得无法收拾，李福林这家伙，好在没有多大野心，他是在烟馆里帮客人点烟灯出身，现在能做到军长就觉得心满意足了。你只要不断他的油水，他在后方倒不会坏你的事情。”

蒋介石也笑嘻嘻地说道：“这倒是真的。娘希匹，老子刚当上总司令没几天，别的那些军就都来争军饷，要武器。这个说那个多了，那个说自己少了，吵得不可开交。只有李福林倒还老实，给他多少就是多少。队伍要都像他那样，我这个总司令也就好当多了！”

“便宜不是货，是货不便宜。”姜仲贤又念起他的生意经道，“天理良心，像叶挺独立团那样的队伍还真是货真价实，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有些家伙，本事也有一点，可就是野心比本事还大，都想当叫鸡公！你看像广东的李济深、潘振山、陈真如；广西的李宗仁、黄绍雄、白崇禧；湖南的谭

延闽、程颂云、唐生智，就都是这样的刺手货！”

蒋介石点点头道：“对他们这些人，我现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权且装阿木林。可要是谁不够朋友，想暗地对老子砍条斧，娘希匹，老子就不信他比共产党还难治！”

“湖南方面，也不是五个手指一般齐的。”姜仲贤好像是在评论古董成色似的慢慢说道，“论声望和资历，当然以谭组庵为最高，此人面善心狠，八面玲珑，哪方面都可以用他作号召。不过你现在已经抬他当了国民政府的代主席，占了汪精卫的位置，也算是位极人臣，他不会再怀什么异心了。程颂云精明能干，恃才傲物，在湖南早已有取谭组庵而代之的抱负，他拼命反对唐生智归顺，尽量讨好共产党和广西方面，也正是想得到他们的支持，日后好同唐生智争个高下，当他的湖南王！”

蒋介石说道：“这回我把程颂云的第六军放在东部战线，封了他个前敌总指挥，也算给他很大面子了。他们到株洲后就直接开往江西，根本不进长沙，这就同唐生智碰不到一起了。至于将来湖南的地盘到底归谁，我对他说：‘颂云兄追随总理在前，唐生智归附革命在后；论功行赏，当然要有先后之分了。’”

“这个话说得好。”姜仲贤赞赏地点着头，又深沉地说道，“不过，日后的程颂云未必能斗过唐生智。姓唐的这家伙翻云覆雨，非同一般。他靠吴佩孚的支持赶跑了赵恒惕，后来又不买吴佩孚的账，最后叫吴佩孚打得没有退路了，这才过来跟我们联络，让我们出兵帮他去打吴佩孚。这家伙脑后定有反骨，你到了前线，还得对他多留点心。”

蒋介石也嘲笑地说道：“谭组庵和程颂云一提起这个人，都是一肚皮气。他们说，唐生智就是靠跟赵恒惕当打手，成了他的亲信，才爬起来的。这样的人要革命，除非狗改得了吃屎。不过，他们这两个何尝不也是这样？娘希匹，我也听说，唐生智在他的队伍里，培植亲信，要求部下像儿子服从老子一样地听他的话。他身边还养了个和尚，整天为他抽签算命，说他的命相如何如何好，他也把那个和尚捧得像神仙一样。娘希匹，看样子这个家伙的胃口还不只是想当个湖南王哩！”

“不管他想干什么，你到了那边，先摸清他的底牌，看看他的斤两，不要打草惊蛇。”姜仲贤发挥着他那一套处世待人的生意经道，“再一个是要多结交当地的绅士名流，让他们知道你蒋某人是礼贤下士的，到时候他们就能帮你说话，这些人就是将来的地盘和民心。”他重新点燃了一根雪茄烟，接着又说下去，“还有，听说湖南那边的国民党部完全是由共产党操纵的，你去了也先当作不知道，千万不能把广东的这一套带到那边去。打吴佩孚、孙传芳还要靠他们那些人出力。”他又把话题一转，谆谆告诫道，“你现在就好比开磨坊的老板拉驴上磨一样，要让它乖乖地听话，就得先舍出点粮草把它喂饱。当然肚皮有大有小，脾气有好有刁，喂多少粮草也要看牲口的成色。总之是一分钱一分货，都要用在刀刃上；这样才能将本将利，一本万利！……”

虽然姜仲贤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但他确实也说出了一些生活的哲理。古时曾经把州官叫作“牧”，不就是这个意思么？《圣经》里也把上帝的使者称为“牧人”，把芸芸众生称为“羔羊”，那意义就更加明显了。那些牧人，只要善于把“头羊”驾驭好，再多的羊群，也会跟在后面乖乖听话了。

接着，他们又对参谋长的人选，进行了一番斟酌。蒋介石先前就听说广西军中李宗仁的助手白崇禧颇有才干，人称“小诸葛”，一直担任第七军参谋长，把原先一盘散沙的广西队伍治理得井井有条，便想把他收拢到自己身边来。不料进行试探后，白崇禧却以“才疏学浅、难当重任”为辞，故意不肯答应。这使蒋介石颇有些恼火了，他向姜仲贤谈了这些情况，表示想另找别人，姜仲贤却劝他还是要以大局为重，从长计议，然后又从容地问他：

“你想还有哪些人担任参谋长合适呢？”

蒋介石看着他道：“原先倒想过三个人：李济深，钮永键，白崇禧。现在已经决定让李济深留守广州。钮永键对上海那边的人事关系很熟悉，我想先派他去做点联络工作。现在看起来，还有白崇禧合适一些了。”

姜仲贤半闭着眼听着，一面点点头道：“白崇禧是广西方面的智囊，你把他收拢过来，对日后的统一两广是一步好棋。再说，你现在重用了他们那边的人，也显得你和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到前线也好拼命用力。这就好比是做合股买卖，他的股分越大，到公司需要贴钱的时候他才越舍得

下血本！”

蒋介石对姜仲贤这番生意经当然早已融会贯通，但他的心情感到有些愤懑地说道：“只是白崇禧这个家伙还在推三阻四，故意卖关子。他总说自己资望太浅，年龄还轻，不敢当此重任。娘希匹，我看穿了，他就是嫌参谋长那个头衔还不过瘾，想在那前头挂一个‘总’字才威风！”

“他说过这样的意思？”姜仲贤关心地问。

“话虽不是那样露骨，可意思是明明白白的。”蒋介石带着嘲笑的口气说道，“他说，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将军德高望重，老谋深算；如果能由李济深将军来兼任总参谋长，他自己情愿当个副职，协助总参谋长的工作。娘希匹，他已经知道李济深要留守广州了，还说这样的话，不是明明为他自己在争吗？”

姜仲贤笑着点点头道：“你就给他加上一个‘总’字。反正一个字又不要钱买，你还舍不得？拿一个字换个参谋长，让他在你身边乖乖地听话，这笔买卖是只赚不蚀的。”

蒋介石听了，犹豫了一会，终于说道：“好吧，老子这回就好人做到底！我今天就给白崇禧发个电报，把我决定让李济深以总参谋长名义，代行总司令职权留守广州的任命正式告诉他，让他担任副总参谋长兼前方参谋长，全权处理一切军务。这回他心里该舒服了吧？老子对他们广西方面总算够朋友啦！”

“你这块肥肉一丢，不怕他不张嘴来咬。”姜仲贤很有把握地说道，“据我看，广西方面的班底，是以李宗仁为头脑，以黄绍雄和白崇禧为左右手。白崇禧虽然智谋过人，素有‘小诸葛’之称，可是他偏重军事，又太自负，非经邦济世之才。黄绍雄有政治野心，为人狡诈多端，但好夸夸其谈，而且斤斤计较小利，军事上没有多少建树，终不过只能起帮闲政客的作用。只有李宗仁这个人胸有城府，不可小视；上个月他来广州活动，一副仁人长者的样子。我看他待人谦和，不露锋芒，貌似平庸，实有大志。这个人你须要用心对付：将来他可能成为你最得力的盟友，也可能成为你最危险的敌人。”

这时正在旁边的机要科长王亚夫尖声插言道：“李宗仁上次在广州住了四五十天，到处攀亲拜友，同共产党的人和俄国顾问都有接触。他向广西方面发电报都是使用自己带的密码，有时就借用第四军的留守电台，不知道他们暗地里搞了些什么鬼名堂！”

蒋介石接口说道：“我知道这家伙到广州来，是想探听虚实，摸摸行情，看看我手里有多大力量。李济深因为抓住了一个叶挺独立团，想用共产党的力量来捞点北伐资本，他就尽量鼓动李宗仁跟他联合，一起来将我的军。说什么要是我蒋某人不愿北伐，他们第四军和第七军合起来就能把吴佩孚打垮！李济深为了做样子给别人看，还接受共产党的提议，把叶挺独立团先派出去。娘希匹，这些手段我都明白，李济深的胃口是想夺我的位置，想要当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这个家伙，怕也成不了大器。”姜仲贤扁着嘴轻蔑地说道，“他想靠共产党的力量来打天下，可共产党那一套真要实行起来他能吃得消？听说他最近又缠上了一个唱广东小曲的姑娘，名叫紫罗兰，才十三四岁年纪。这样的荤客，你叫他去受共产党的那些戒条不是要了他的命么？”

蒋介石也咧着嘴笑道：“娘希匹，我早看穿他了。他接受共产党的独立团，一来是想扩大个人的实力；二来是跟叶挺拉过去的私人关系。其实，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消灭共产党，比我的性子还急。三月二十号那天，我以为我真的要跟共产党翻脸了，抢着向我提出要取缔农民协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禁止一切工农运动，宣布共产党为不法之徒。当时就叫我顶回去了。”

“他还是脚踩两只船。”姜仲贤老于世故地指点道，“他向你提出那些反共议案，实际上也是想向你试探一下，摸摸你的底牌，他好从中取利。对这样的家伙，还得防他一手。你这回出发到前线以后，留他坐镇广州，也不能让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抢在你的前头，闹得局面不可收拾。”

“这一点我早有布置了。”蒋介石看了王亚夫一眼道，“我让机要科在我出发以后，派专人监视李济深在这边的情况，随时把他的谈话和行动用密电报告我。”

王亚夫在旁边立刻恭敬地说道：“我已经新编好了一套密码，安排一位可靠的同志负责，让他随时和我们前方联络。”

姜仲贤满意地点点头，又道：“李宗仁虽是七军军长，可他的老家还在广西；七军的那几个师长又都是些叫鸡公，翅膀硬了一个也不会听他的。所以要特别注意他跟广西方面的来往，对李宗

仁他们几个多下点工夫。”

“上次李宗仁回去，我给了他们七军一千支步枪，四挺重机枪，两部无线电台。”蒋介石显得很慷慨地说道，“我对他说，以后只要第一军有的，也要先照顾第七军。看样子他还知点好歹，不像四军的潘振山那些家伙，娘希匹，就像你欠他的债一样，你再给他好处，他嘴里也没有半个谢字。”

“潘振山这种二杆子货，刚猛有余，谋略不足，终究成不了气候。”姜仲贤喝了两口茶，放下茶杯道，“十师师长陈真如比他有心计，可军事上又不行。我看四军最可畏的，还是独立团团长叶挺。这个人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就很器重他，论地位他应当在潘振山这些人之上，可他甘愿放弃高位，接受共产党的命令去充任独立团团长，不能不说是有相当的政治头脑。再看他在湖南指挥的这几仗，真可说有制胜千里的大将之才。此人若能为我所用，足可抵得上十万精兵！”

蒋介石连连摇头道：“他比陈独秀还赤化得厉害。听说发生‘中山舰事件’后，他在独立团讲话，把我比作第二个陈炯明！娘希匹，要不是还要让他带队伍北伐，老子现在就能收拾了他！”他的语气变得凶狠起来，有点咬牙切齿的样子，额上的青筋也暴出来了。

姜仲贤温和地劝慰他道：“宰相肚里划得船，说什么由他说去，只要他在前头同吴佩孚的队伍拼命，你什么话都只当没听见。这样的人重气节，不像有些家伙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他以前对孙中山忠心耿耿，现在对共产党忠心耿耿，焉知将来不能被你感化过来，忠心耿耿为你干事？”

蒋介石点点头，说道：“对共产党的一些人，我倒是真心想用他们。前几天放出李之龙的时候，我还亲自同他谈了一次话。我说：‘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就是校长处罚学生处罚错了，学生也不应当记他的恨，因为校长毕竟是为学生好的’后来我又说，‘即使你记恨我，我也还是要重用你；我要安排你在总司令部做事情，或者到前方去带兵。’这家伙大概吓破了胆，说他不愿再带兵，只想到前方做点宣传工作。我批了几百块钱，让他去找邓演达，到政治部办剧团去了。”

姜仲贤赞扬地连连说道：“对，对！要赚大利息，就要舍得出本钱。就像俗话说的：欲求生受用，须下死工夫。孙中山一生吃尽了苦头，东跑西颠，搞了十几年的北伐，也没打出过韶关。你现在人还没离开广州，眼看湖南湖北就都快到手了，这样大利息的买卖，天底下还能到哪里再去找？……”

蒋介石想起姜仲贤在说这些话时的神情，不觉又一次得意地笑了。从前方和后方发来的这些文电中，也都报告着他在这些日子里煞费苦心进行部署所取得的成功：平江之战已得到完全胜利，这个胜利使吴佩孚大为震动，匆忙地从北京赶回了武汉，湖南境内已再没有北洋军的嫡系主力了；后方广州的情况也很平静，正如姜仲贤所预料的，李济深接受了总参谋长和留守后方的重任后，十分志得意满，整日在广州歌舞升平，没有出现任何图谋不轨的迹象。何应钦指挥的第一军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也顺利地肃清了东江潮梅地区的残余敌人，正在进行向福建方面发起进攻的准备。东路军所属的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和第一军两个师，也都已集结在赣东和赣南地区，随时可以向孙传芳的队伍发起进攻。蒋介石看完这些电报，他感到目前最使人担心的，还是粤汉铁路正面吴佩孚的主力。他知道，吴佩孚必将在汀泗桥部署重兵，并企图从这里扭转整个战场的局势。这场战斗对双方确实都是十分关键的：如果吴佩孚失败，汀泗桥以北直至武汉外围地区再也无险可守，失掉了武汉，沿京汉铁路直到豫鄂交界的武胜关也再没有险关要隘，吴佩孚就将很快失掉整个湖北；如果国民革命军在汀泗桥失败，吴佩孚就可乘胜沿粤汉铁路长驱直入，就像他五年前追击赵恒惕的湘军那样，一旦长沙失陷，株洲衡阳也断难守住，国民革命军费尽千辛万苦占领的湖南便将迅速失去。蒋介石想到这种可怕的后果，不禁也感到全身一阵躁热；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他们仍将退回五岭以南的广东，这几年辛勤操劳准备北伐的努力前功尽弃，而且也许还意味着广东革命队伍的瓦解，他们永远再不会有重新进行北伐的能力了。想到这里，蒋介石不禁咬紧牙关，青筋暴出，狠狠地用拳头打在桌上道：“娘希匹，这是不可能的？……老子这一次无论如何也要在汀泗桥得胜！”

正当蒋介石在暗自发恨，一面对着地图查看汀泗桥周围情况的时候，副官处长进来向他报告：“加伦将军想要见您，不知总司令现在有没有时间？”

蒋介石顿时像得到了一股巨大的力量，从茫然的心情中振奋起来，连连点头笑着说道：“好，好，快请他来，快请他来！”

加伦将军就是苏联共产党和政府派来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革命的军事顾问团的总顾问。三年前，国民党的创始人和领袖孙中山先生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失败挫折之后，终于从痛苦中认识到：欧美的资产阶级政府不仅不会真正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反而站在敌人方面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镇压民众。因此，他开始了一生中的重大转折：向年轻的社会主义苏联伸出了求援之手。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立刻接受了孙中山的请求，在当时苏联国际国内的环境还十分险恶，生活条件还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从海上给广东的国民政府送来了大批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同时又应孙中山的要求派来了以鲍罗廷为首的政治顾问团和以巴甫洛夫将军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庞杂涣散的国民党，建立了培养革命军官的黄埔军校，巩固了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在协助孙中山指挥军队击败反革命武装的战斗中，巴甫洛夫将军不幸在前线以身殉职。不久，苏联又从国内战争的战场调来了富有经验的高级指挥官加伦将军，担任军事顾问团的总顾问。

加伦的原名是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他虽然只有三十七岁，但在苏联国内战争的战场上却已久负盛名。他是在当时苏联红军中很少有的工农出身的高级指挥官之一，出生在雷宾斯克城附近农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青年时代在麦蒂希车辆制造厂当工人，因为号召罢工被沙皇暗探逮捕，关押了三年。后来被送进军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战斗中受了重伤，于一九一五年退役。回到家乡不久，他就秘密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十月革命胜利后，加伦作为工农红军的一名指挥官，参加了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战斗。国内战争年代很多传奇式的征战和胜利，是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一九一八年九月，加伦将军第一个被授予苏维埃共和国红旗勋章。来中国之前，他曾经担任苏联远东共和国红军总司令、陆军部长和军事委员会主席。

来到中国后，他和蒋介石一起指挥了国民革命军的两次东征。在他那杰出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的作战经验的帮助下，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主力的东征军旗开得胜，接连取得了重大胜利，很快消灭了数万之众的反革命叛军，收复了东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在危急的时刻，当蒋介石惊慌动摇、束手无策的时候，加伦将军那镇定的神态和果断的建议，总是能使局面转危为安，很快扭转了战场的形势。这使平时刚愎自用、性情执拗的蒋介石，也不得不对他表示衷心地钦佩，视他为自己在战斗中的力量和依靠。两次东征胜利后，加伦将军因为积劳成疾，曾经回国一段时间，今年五月初叶挺独立团向湖南出征，即将揭开北伐战场的序幕之前，蒋介石请求苏联政府将加伦将军再次派到中国，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顾问。于是，加伦将军很快又赶回了中国，他的到来更坚定了蒋介石加速出师北伐的决心，并立即参与了对北伐战场全局的部署和对湖南前线战事的指挥。在这次长途的艰苦行军中，加伦将军的坚韧毅力和吃苦精神也深深感动了总司令部的官兵们。

副官处长退出去不一会，加伦将军很快就同一名中国翻译来到了蒋介石的车厢里。在魁梧的俄国人中间，加伦将军的身材是比较瘦小的；他虽然只有三十七岁，但看上去却比已经四十岁的总司令蒋介石显得苍老。黧黑、瘦削的脸上，两道黑色的浓眉，一双略带灰色的眼睛里总是射出沉静而严肃的光芒，那目光仿佛能洞察一切。高高的鼻梁，下颏上有一撮短短的山羊胡，这给人留下慈祥长者的印象，使他显得亲切而幽默。他的举止敏捷果断，充满着军人的力量；他穿一套国民革命军的青灰布军服，没有佩戴军阶和部队的符号，大沿军帽上也没有帽徽，但他的着装一丝不苟，军人姿态显得十分严整。蒋介石急忙几步抢到门口，非常恭敬地迎接他。这位总司令在部下面前虽然总是威风凛凛，但在俄国顾问们的面前却很恭谨谦逊，对政治总顾问鲍罗廷和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更是以师礼相待，因为这两位总顾问都是在孙中山生前就来到中国的，很受孙中山的敬重，而他蒋介石又是孙中山事业的最忠实继承人，尊敬他们自然也就是如同尊敬孙中山本人了。加伦将军也很亲切地同蒋介石握手问好。他们一同走到车厢中的沙发上坐下，翻译也坐到他们旁边，一个副官送上来两杯咖啡。加伦将军望着蒋介石用俄语说道：

“总司令，平江战役已经结束，你对敌军将要采取的重大行动作出充分估计了吗？”

蒋介石听翻译把这几句话说完，便瞪着大眼望着加伦将军点头道：“唔，这个，我正在研究从前方送来的报告。根据各方面情报，我认为敌军将要采取的下一个重大行动，很可能就是要利用汀

泗桥的险要地形部署防御阵地，以便大量消耗我军然后进行反攻。”

加伦将军微笑着表示赞同地点点头，又道：“如果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应当怎样采取有利的对策呢？”

蒋介石虽然对下一步行动的思考还不成熟，但他不愿让加伦将军看出这一点，便显得胸有成竹地故意抬头向车厢顶上望一瞬，然后竭力以一个沉稳老练的统帅的姿态，字斟句酌地拖长了声音说道：“这个……现在第四军已陆续从平江出发；第七军和第八军也正沿粤汉路向湖北前进；吴佩孚即使能很快向汀泗桥部署三个师，我们以三个军也有绝对胜利的把握。”

加伦将军看着蒋介石的神态，知道他并没有考虑好全面的战略部署，但他也从这几年的共事中深深了解蒋介石的性格，便竭力不去损害他的自尊心，只是点点头，接着说道：“将军，前线力量的对比对我方当然是有利的。我的意思是，现在应当对这些兵力的使用作出更周密的部署。”

蒋介石本来也希望从加伦将军那里听到具体部署的意见，这时便显得很谦虚恭谨地微笑着向加伦将军道：“我也正想要请顾问一起研究这件事，您对此有什么好的意见呢？”

加伦将军的语气坚定而从容地说道：“综合各方面的情报，吴佩孚要在汀泗桥进行阻击是势在必然的。从那里险要的地形看，利于防守，不利于进攻的队伍展开兵力；我们虽然有三个军可以同时赶到那里，但真正能投入第一线战斗的兵力将会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还有一个对我们十分不利的情况是：现在正值夏季，长江的洪水已经溢满了那一带所有的湖泊，敌人的海军舰队可以利用那些四通八达的湖泊自由调动；如果我们的主力全部集中到汀泗桥以南的铁路沿线，一旦吴佩孚从水路迂回到侧后，就将会给我们造成致命的威胁。五年前，他就是使用这样的战术战胜湘军的。”

听着翻译说完这一段话后，蒋介石不禁暗自佩服加伦将军的高瞻远瞩，正好解答了他刚才担心的问题。不过他仍然还是像一个深谋远虑的统帅那样沉默了一瞬，然后便又恭敬地望着加伦将军说道：“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这个，为了打破敌人的计划，对于具体部署，您还有些什么好的意见？”

加伦将军以军事统帅所具有的果断语气说道：“我建议以一个军担任对汀泗桥的正面进攻；一个军担任向铁路左翼长江沿岸的警戒，务必控制住敌人海军可能登陆的第一个港口；另以一个军担任后卫，保护汀泗桥以南直至岳州的铁路沿线的安全。如果您同意这样的部署，就可以在即将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上确定每一个军战斗使命。”

蒋介石立刻用坚定的语气说道：“唔，这个很好！我马上就让参谋长制定一道命令。……我看，正面进攻汀泗桥的责任，是不是还是交给第四军去完成？”

加伦将军道：“第四军的战斗力当然是最强的。只是他们刚刚经过平江战斗，没有来得及休整，而且他们现在的行军路线又十分艰巨，不用说沿途会遭遇敌人的阻击，就是湘鄂边界的幕阜大山也够他们爬好一阵子的了。”

蒋介石的决心似乎不可动摇地说道：“不要紧，我发电报叫他们加快行军速度，他们是一定可以担负这个责任的。”

加伦将军已经很了解蒋介石的性格，他刚愎自用，器量狭窄，无论争论什么问题，他最后总要坚持自己的决断，有时甚至不近情理。因此，只要不是军事上的重大原则问题，加伦将军也不屑与他进行争论，否则同这样的人共事确实是十分困难的。另一方面，加伦将军也深深了解第四军的战斗力，共产党人叶挺指挥的独立团一直在前线承担最艰巨的使命，一次次胜利的记录已经证明了他们确实是一支无坚不摧的劲旅。另外的两个师虽然比他们略逊一筹，但共产党员的政治工作也很出色，同国民革命军其他各军相比，他们的战斗力显然也是出类拔萃的。加伦将军对蒋介石急于求胜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便没有再同他进行争辩。他当然不会完全了解蒋介石此刻在他那瞬息万变的复杂心理活动中，已对这三个军的情况作了一番更全面的权衡，除了战斗力的因素之外，他感到现在让第四军在最前面最先打到武昌对自己更有利一些，因为李济深目前毕竟比七、八两军的军长同自己的关系更为亲近。

在谦恭有礼地送走加伦将军后，蒋介石便立刻叫来副官处长，让他先请参谋长白崇禧到车厢里来，然后传令总司令部的专车一小时后向长沙开进。副官处长退出去后，蒋介石便在办公桌后

正襟危坐，提起毛笔批阅文电。

不一会，参谋长白崇禧来到了总司令的车厢。他虽然只有三十三岁，但是头发已经有些谢顶，这是谋略和智慧的象征。略带长型的脸，不高不矮的身材，一双深沉有神的眼睛光芒逼人，马靴乌亮，军服严整，行动显得精干而又富有锐气。他来到这里并没有戴军帽，这一方面是因为天热，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在总司令的面前故意显得十分随便；因为人们知道蒋介石对军风纪的要求非常严格，除了加伦将军外，总司令部每个官兵如果少扣一颗衣扣都会受到他严加申斥的。但白崇禧却似乎有点“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脾气，照例我行我素，在他的面前毫无顾忌。蒋介石看在眼里，虽然一肚皮怒气，但想到他确有调兵遣将、运筹帷幄的才干，为了让他尽心尽力地发挥出来，因此对这些小事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毫不计较的样子。

白崇禧走进车厢，随便地同蒋介石打过招呼，便在办公室旁边的皮椅上坐下。蒋介石也好像并未注意到他的礼节不周，仍然面带笑容道：

“健生，刚才我同顾问商量了进攻汀泗桥的一些部署，请你来制定一个命令。我们到长沙要很快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各军的长官都要参加，你来报告我们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接着，蒋介石把刚才同加伦将军商定的那些内容向白崇禧说了一遍，最后道：

“就是这个样子，唵，健生，你去制定一个命令。同时给第四军发一个电报，要他们加快行军速度，三天之内一定到达湖北通城。”

白崇禧平静地说道：“那一带山高路险，现在天气又热，沿途还可能有敌军抵抗，这个要求恐怕他们很难达到。”

蒋介石也温和而固执地说道：“可以的啦，喳，这个，这是军事需要啦！”

没等蒋介石说完，白崇禧就从皮椅上站起来道：“好，我就这样命令他们。”说完，便大步向车厢外面走去了。

蒋介石看着他的背影，只是冷笑了一下。“宰相肚里划得船”。他的耳旁不觉又想起了姜仲贤的声音，“你当了总司令，那些叫鸡公不会服服帖帖听话的。要一个一个对付，先不能树敌太多；秦始皇统一六国，也还是有先有后。千万记住，小不忍则乱大谋。”

他平静下来，继续去批阅文电，头脑里一面想着在长沙的第八军军长唐生智最近的种种行动：大批扩充军队，分封省县官吏，利用西部战场总指挥的身分竭力拉拢第四军和第七军的长官；听说暗地里同北方的孙传芳和张作霖还有过联系……种种迹象表明，这家伙的野心实在非同一般，看来当初吴佩孚要想除掉他不是没有道理的。目前这个时候，当然还不能同他翻脸，但到了长沙必须见机行事，认真对付。

副官处长进来向他报告，专车很快就要开动了，他表示命令没有改变。副官处长刚要走出去，蒋介石突然又想起一桩重要的事，叫住副官处长道：“你马上请王秘书到我这里来，带上那篇我让他起草的《北伐宣言》。”

“是。”副官处长答应着，转身向车厢门口走去。

王亚夫的机要科那节车厢就在蒋介石办公室的车厢后面，因此很快就来到了。他手里捧着厚厚一叠文稿，轻手轻脚走近办公桌道：“校长，您现在就要？……写倒是写好了，就是不知行不行。”

“我看，这个，到长沙就发出去……”蒋介石说着，接过那叠文稿。他最关心自己授意的那些话是否都写上了，因此迅速地翻来翻去，那些字句便立刻跳到了他的眼前：“赤为何义？苏俄之赤党与赤军，以赤帜表示其革命群众之赤血，换得其国家独立自由之代价也。解放人类之痛苦，保障人民之利益，以民众为基础，而推翻其帝制之白党，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实行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为全世界十二万万五千万人类谋解放者也。帝国主义口中之赤化者，实则革命之民众化耳。政府为民众化之政府，军队为民众化之军队，以民众化之国民革命军，拥护多数被压迫之类，即使云赤，何嫌何疑？……”

蒋介石看着这些，浮起一丝冷笑，一面暗想：这些话发表出去，俄国顾问和共产党员们听了还能不高兴？娘希匹，让他们兴高采烈地去快活一阵吧，那样他们才肯卖力气去打吴佩孚。正像姜仲贤说的：“反正漂亮话又不要钱买，拿几句漂亮话去换他们到战场上拼命流血，那是蚀不了本

的。”

王亚夫站在旁边，见蒋介石盯着那一段最过激的词句，一直没有说话，以为他是对那些词句感到不舒服，又想打主意变卦了，便抢在前面，小心试探地提醒道：

“校长原先的意思……不过，我看这些话也实在有点……”

“很好！喳？娘希匹，就要这些话！”蒋介石眉开眼笑地看着王亚夫道，“就照这个发表。不用再改了，喳？要快一些。”

王亚夫从蒋介石手里接过那叠宣言文稿，又问：“到了长沙，要不要筹备开个发表《宣言》的大会？”

“那就要耽搁时间了！”蒋介石从桌前站起来说道，“一定要在同吴佩孚的主力决战之前发表出去。越快越好，喳？不能再往后拖！”

“好，我懂。”王亚夫心领神会地点头，他那马脸上现出神秘的笑容道：“这个《宣言》发表出去，恐怕连上海那边的阿德哥他们，看了都会吓一大跳呢！”

“不要紧。”蒋介石冷笑一下道，“他们迟早都会明白的。”

王亚夫又轻手轻脚地走出去了。蒋介石还站在那里，想着他刚才的话。确实，他的这篇《北伐宣言》，其措词之激烈，真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了。这是他就任总司令后的一篇正式《宣言》，通电发出后，全世界都会知道。将来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如果能够打败吴佩孚，他蒋介石能夺得控制全中国的权力，一切都可以用行动来证明他的真实心迹，人们只会称赞他这样做是一种了不起的胆略。然而，如果打不过吴佩孚呢？那么谁也不会再相信他的空口白话，他这种比共产党还要赤化的形象在上海的那些朋友和外国人面前恐怕就再难以洗刷清白了。这的确是他在实现自己理想道路上的又一次大冒险，这次冒险押上的赌注是他的前途和命运。但是，他不下这样狠心的赌注，就消除不掉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心中因“中山舰事件”留下的阴影，就难以取得他们对他的完全拥戴和信任，就不能使他们在北伐战场上拼命向前、视死如归。那么，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那个拥有控制全中国的至高无上权力的理想，就会变成泡影。想到这些，他不禁又想起了在广州姜仲贤引用的那句古话：“欲求生受用，须下死工夫。”他两眼望着车窗外闪过的田野，一只手握紧拳头，用力打在桌上，狠狠地说道：

“娘希匹，这一宝老子押定了！”

## —

巍峨高耸的幕阜山，像一条青色的巨蟒，东起波阳，西至洞庭，纵横数百里，蜿蜒盘踞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边境上。那些重重叠叠的峰嶂，到了湖北和湖南两省交界的地方时，变得更加险峻陡峭，如同一道天然的屏障把两省隔绝开来。幕阜山主峰的南麓是湖南省的平江，幕阜山主峰的北麓是湖北省的通城。这一带因为地理位置重要，历代都是兵家的必争之地。汉朝的伏波将军马援，三国时吴国的大将太史慈，宋朝的著名民族英雄岳飞，都曾经在这里留下过征战的足迹。明末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兵败后也是在幕阜山脉的九宫山中，因为迷失道路而被地主武装杀害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些不畏艰险的樵夫和采药人，就用他们那比岩石更加坚硬、比荆棘更加顽强的双脚，在陡峭险峻的山崖上和浓密阴森的原始森林中，踏出了一条条崎岖的羊肠小路。后来，不知又经过了多少代人的脚印，那些小路被踏得越来越宽，越来越坚实，有些特别陡峭险峻的地方，还铺上了像台阶一样的一层一层的石板。于是，渐渐的，这条先前只有猎人和樵夫的足迹才偶尔踏到的深山小径，变成了一条沟通湘鄂两省交通和贸易的“官道”。虽然不久前建筑起来的那条粤汉铁路的第一段——武昌到长沙的铁路线，就在离这条“官道”不远的幕阜山和洞庭湖之间的狭窄丘陵地上蜿蜒穿过；但是，从军事家的眼光看来，这条“官道”的地位却显得更加重要了。因为如果由南向北进攻的军队，沿着这条道路翻越了湘鄂交界的崇山峻岭，便可以居高

临下地切断武长铁路，使完全失去了防御屏障的从长沙到岳州一线的队伍，变成毫无抵抗力的瓮中之鳖，陷入进退维谷的绝境。这也正是吴佩孚在得到革命军从广东向湖南进攻的消息后，立刻派鲍鄂将军带领北洋劲旅进驻到幕阜山南麓的平江城，以便扼守住这条通往湖北的要道，确保省城长沙和武长铁路安全的原因。

叶挺独立团在攻克平江以后，主力于第二天——一九二六年的八月二十日离开驻地安平桥，继续向北洋军阀在长江中游的大本营——湖北武汉进军。由于这一带山路十分崎岖难行，他们在出发的第三天，队伍才到达湘鄂交界的边境。从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看，这一段距离似乎并不很远；但俗话说：“望山跑死马”，那蜿蜒曲折的山路，有时从这座山到那座山之间就要使人汗流浃背地奔走大半天。万先廷虽然生长在山区，但自从离开韶关后，连续几个月的山地行军，也使他感到有些累了。那些重重叠叠的崇山峻岭，左盘右旋的崎岖山路，仿佛永远也走不完似的。刚刚到了尽头，但是转过一道弯去，前面又展现出一片和先前一样的情景，好像又回到了原先已经走过的那些道路上似的。对于那些不是生长在山区的广东籍弟兄们来说，在炎夏酷暑中的山路上行军，就更加困苦劳累了；但是，尽管他们一个个晒得脸上蜕了皮，肩上被步枪和弹带磨得溃烂了，脚上的泡破了又打出新的，他们的精神还是那样的振奋，队伍还是那样的严整，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没有显出一点萎靡拖沓的样子。这两千多名像钢铁一样黑瘦精悍的士兵，保持着旺盛的士气和斗志，一路高唱着他们独立团最喜欢唱的那两首歌曲：《打倒列强除军阀》和《少年先锋队歌》，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前进。

第六连的队伍，在行军中最为活跃。这除了因为连长万先廷在队伍的前后照应，鼓舞着弟兄们的革命热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刘大壮在弟兄们中间，他不时幽默风趣地讲一段笑话，引起人们一阵阵欢快的笑声，驱散了行军中的劳累和炎热。当周围有些弟兄们在艰苦的行军中对崎岖的山路忍不住发出怨言的时候，他仍然微笑着开导他们道：“别看这山高路陡，山里可是个大聚宝盆，养活人们的东西可多着哩。”他知道哪些野果可以解渴和充饥，哪些草药可以消肿和治病，哪些植物是有毒的，他把这些知识都耐心地教给那些新兵们，告诫他们别看这些都是不起眼的小事，可到节骨眼上就能给人排忧解难，甚至活命救人。连里有些弟兄有的肩膀被枪托磨破了，有的双腿扭了筋，宿营时让他寻把草药敷一下，或请他用手推拿几下，便都很快见效，没有影响行军的速度。当人们敬佩地称赞他时，他总是温和地一笑：“我算什么能人？在咱们独立团，能人可是多着哩！像团长、齐营长那样的人，那才真正算得上是能人。……你看咱们团长，在军阀队伍里是该坐轿子的，至少也得骑马；可他还不是和咱们一样在走路！……也只有在咱们独立团！”

虽然在平江战斗以后，缴获了不少北洋军的军马，团里连长以上军官都配备了马匹，但他们仍保持着从广东出发以来的老规矩：包括团长在内的所有军官都和弟兄们一样徒步行军，把马匹让给生病和在路上摔伤的弟兄们骑。在独立团，军官们比士兵还更为辛苦一些；他们除了要照应队伍，布置宿营地和思考战斗外，还要在路上关心每个士兵的身体，为那些中暑或摔伤的弟兄们扛枪、背行李。不过，他们都很愉快、真诚地去做，因为团长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他们：共产党员的官长就应当是这样做的。

现在，团长仍然和平时一样，沉默而严峻地走在队伍中间。从广州出发时，全团只有一匹白马，是专为团长配备的，但行军时叶挺却从来没骑过，他总是交给医疗救护队让路上得了急病的弟兄们骑。现在团里的马匹虽然多了，他也还是这样，同弟兄们一起徒步行军，他时而走在队伍的前面，时而走在队伍的后面，以自己的行动给弟兄们以鼓舞和力量。他穿的是和所有军官们一样的普通青灰布军衣，头戴大沿军帽，身佩武装带，打着皮绑腿，脚上穿一双深蓝色的轻便胶鞋。他的左肩背着一副装在皮套里的、德国造长筒望远镜，武装带的右侧挂着一支黑亮的左轮手枪，手里提着一个装满军用地图的黑色手提包。不论在什么时候，他的军容总是那样整齐端正，一丝不苟，连一个风纪扣也不松开，即使在炎夏酷暑的山路上行军也是这样。因此，当团长走到哪个连队前面时，弟兄们都好像听到一个无声的命令一样，精神立刻变得振作起来，原来感到天气特别炎热的也不觉得炎热，原来累得两条腿几乎拖不动的也不知从哪里生出了力量，走起来步伐格外坚定了。万先廷起初感到奇怪，因为团长平时很少说话，也并不大声训斥部下或讲多少莺要的

道理,但全团的官兵们都是那样的钦佩和敬畏他,把他的每一句命令当成和自己的生命同等重要,甚至为了实现这个命令不惜自己的生命。后来,万先廷才渐渐从团长的行动中悟出了一点道理,就是他感到团长身上具备了一个指挥官最宝贵、重要的品质:要使士兵们能够不怕死,指挥官首先应当不怕死;要使士兵们能做到的,首先就应当是指挥官能够做到的。有了这种品质,你就可以指挥士兵们去创造任何奇迹。

当然,首先要让士兵们了解和信任指挥官,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万先廷刚到独立团时,就听高洪生讲过一些关于团长的传说:有一次部队从驻地肇庆到外地去参观,来回行军一百五十多里,那时独立团还刚刚建立不久,弟兄们行军缺乏耐力,感到十分疲劳,回来时队伍有些稀拉、松散。团长发现以后,立刻下达了一道紧急战斗命令:一股叛军已越过开平向广州国民政府进攻,军部命令我团在六小时内抢占高鹤,阻击并消灭来犯的叛军。于是,部队来不及休息,又立刻连夜急行军一百多里,边走边吃干粮,在凌晨前赶到了高鹤。但是,这样还是比命令要求的时间晚了一个多小时,而且弟兄们还有不少掉队的,模样都很狼狈,情绪也显得非常沉重。团长集合队伍讲话的时候,并没有厉声训斥大家,而是很肃穆地告诉弟兄们:这是一次战斗演习,如果真的在战斗中发生这种情况,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作为一个革命军人,不仅要有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和勇气,而且要有克服任何困难的体力和耐力。从那次教训以后,弟兄们都更加注重了体力和耐力的磨练,努力使自己成为钢铁般战斗集体中的一员。

万先廷看着在蜿蜒起伏的山路上前进的队伍,内心充满了自豪的感情。当他们离开安平桥的那天清晨,直到队伍走出好远,他还忍不住频频回首去遥望那已经变得模糊的故乡,竭力想辨认出使他倍感亲切的青龙寺和大叔家的房屋在什么地方。一路上,大凤那双含情脉脉、泪光滢滢的大眼,总是浮现在眼前,牵动着他的心。几个月以前,他在亲人们的祝福和期望中,怀着急切寻找革命的心情到了广东去;这一次,他又匆匆向盼望已久的故乡和亲人们告别了。这一次的别离,时间会更加漫长,距离也会越来越遥远,因此,当他离开故乡和亲人的那一天,在青龙寺门前同大风分手时,心中也就有一种同上回他们别离完全不一样的依依之情。

不过,当他走进队伍的行列,随着那洪流一起前进的时候,他的心胸又渐渐变得开阔,感到他们的命运是和这革命洪流紧紧联系着的。万先廷知道,团长离开广东向前线出发的时候,新婚还不到一个月,他们是在驻地肇庆结婚的。团长对妻子李秀文女士的感情十分深挚,但是从出发以来,却从未见到过团长的情绪有丝毫的变化,正如有一次齐营长所说的:团长是那种善于把丰富的感情深埋在心底的人,虽然没有漂亮的言词和过分热情的举动,但这样的爱却更加持久和强烈。想到这些,万先廷就感到他也应当学团长那样,把对大凤和故乡亲人们的最深挚的爱,埋藏到心底,而勇敢地向北伐前线进军,使北伐革命早日得到完全的胜利。他觉得这种想法也正是大凤和故乡亲人们所希望的。

当他们的队伍到达湘鄂交界的分水岭时,已经快要到中午了,团部用号声通知各营就地休息吃饭。那些早已晒得满面通红,累得军衣汗湿的弟兄们都立刻跑到树下或荫凉的地方去,按各班集中把步枪架到一起,解下身上的皮带和子弹带,放下背包和斗笠,纷纷喝水、抽烟,到处是一片热烈的忙碌气氛。

第二营休息的地方,正是在分水岭的最高处,也就是湘鄂两省正式分界的地方。这座分水岭,在军用地图上叫做界牌山,附近老百姓叫它“牌子岭”,因为山上有一块标明湖南湖北省分界的石碑。在两省分界的地方,还有一座古老的房屋。两省的界线就在这座房屋的堂屋中间分开;它的一半属于湖南,一半属于湖北。房子的主人也是两家,一家自然是湖南人,一家也自然是湖北人;他们世世代代和睦相处,周围的人们都把这座房屋叫做“界上屋”。

在离界上屋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小溪,那溪里的水从一道山泉发源,一边流向湖南,一边流向湖北。万先廷布置好了警戒,又帮助伙计班埋锅造饭,正准备到弟兄们休息的地方去看看时,他的勤务兵张小鹏拿着两个湿漉漉的军用水壶,兴高采烈地跑过来,把一个水壶递给他,说道:

“快喝吧,连长,这是流往湖南那边去的水,过一会儿就再喝不到了!”

万先廷接过水壶,不解地问道:“哪是流往湖南去的水?”

“那边!”张小鹏指着不远处一片葱绿的树丛后面说道:“真有意思,分水岭就是这样的!一边

流到湖南，一边流到湖北。平江来的弟兄们都在喝流到那边去的水哩，我费了好大劲才挤进去灌了两壶！”

万先廷这才明白，不觉也笑了。他向张小鹏说道：“你去休息吧，现在没有事了。等会听号音到伙伙班去打饭。”他知道张小鹏喜欢热闹，平时有空总想到班里和弟兄们一起玩，现在行军中的休息时间正是好机会。

要在平时，万先廷自己也会和弟兄们一起说笑的，不过今天他自己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独自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他的军衣口袋里，珍藏着大凤临别时送给他的那个绣花荷包，那里面不仅有一个需要解开的谜，而且是装着一颗他最热爱的少女的心。他一直记着大凤在送给他这个荷包的时候，那样孩子气地望着他，充满着少女的羞涩和深情，低声对他说：

“等过了湖北界再看……”

现在，他已经站在湖北这边的土地上了，喝着流往家乡的溪水，他可以按照大凤的叮嘱解开那个珍贵的荷包中的“谜”了。万先廷坐到那些灌木丛中间的一块草地上，细心地把双手擦干净，然后从军衣口袋里拿出了大凤在临别时送给他的绣花荷包。那上面的一对鸳鸯是那样生动活泼，色彩鲜明，那是一双多么灵巧的手绣出来的啊！他仿佛又看到了大凤兴奋时格外妩媚动人的微笑，在那对黝黑而明亮的大眼睛里，该有多少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丰富的情感，该有多少对亲人的祝福和希望啊！想到这里，万先廷仿佛看见大凤就在眼前，他深情地笑了。他怀着急切的心情，打开了那个荷包的暗扣，那里面上只有一个用崭新的红绸裹着的小包，细心地用丝线缠着。万先廷激动地解开那缠着的丝线，打开包着的红绸，看见红绸里面是用红丝线缠得很整齐的一小绺头发。万先廷一眼就能看出，那是大凤自己的头发，一定是她在剪了辫子后留下来的；那乌黑纤细的头发，闪着柔和的光泽，使万先廷感到那么亲切。记得小时候，村里的姑娘们就都十分羡慕大风的那一头又黑又细的柔发，她那条又粗又长、乌黑发亮的大辫子增添了少女的青春光彩。人们常说：头发柔细的姑娘性格温和，心地善良，会体贴别人，做事心灵手巧。万先廷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但他觉得大风确实是这样的一个姑娘，不知是因为她生着这样的美发才有这样的美德；还是因为她具有这样的美德才生出来这样的美发。现在，她把这最珍贵的头发藏在亲手绣的荷包里让自己带在身边，这意味着什么呢？……万先廷想到这里，心底顿时充满了甜蜜和温馨。

虽然万先廷和大凤从小在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但是直到他离开家乡去了广州，才真正体会到他们之间那种纯洁而深挚的爱情。童年时他和大凤的感情就像亲兄妹一般，他们一起上山砍柴，一起插秧割谷，真是生死相依，形影不离。那时候，大凤把万先廷当成自己的亲哥哥，万先廷把大凤当成自己的亲妹妹。即使在他们都渐渐成年以后，也从来没有想过还会有另一种感情能超过这种亲密的兄妹之情。然而，是什么引起了他们感情上的微妙而巨大的变化呢？

是别离，是那第一次遥远而充满辛酸的别离。啊，那些令人激动的、充满着深情的叮咛和真挚的祝愿的时刻，它在多少羞涩的年轻人心中播下过爱情的种子，它给多少刚刚萌发出来的爱情嫩芽带来了滋润生长的雨露，甚至对那些在爱情的风暴中遭到了创伤的心灵，它也会运用那怀念和记忆的力量，产生妙手回春的作用。……

总之，我们的这一对年轻的主人公，就是在那一次遥远的别离之后，好像才突然感到他们之间有着一种比兄妹之情更加特异的感情。虽然万先廷和大凤都是生长在封建势力十分强大、闭塞的山乡里，他们不善于那种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但是，正像受着大自然的孕育而开在山岭崖畔的映山红一样，他们的爱情也显得更加富有活力；他们之间的情感也更加朴实、专一和真挚。正是在他们刚刚体味到初恋的甜蜜和幸福时候，队伍又向北伐的前线开拔，向着那更为遥远的艰险征途，向着那炮火纷飞、出生入死的战场走去。对于这匆匆的别离，他们虽然难舍难分，但他们也都懂得这是革命所需要的别离，这个目标是比他们的爱情和生命都更为崇高重要的。他们在含泪的微笑中分手，万先廷接过大凤送给他和刘大壮的那两个荷包，匆匆走进了行进的行列。他赶上第六连的队伍后，就把其中的一个荷包交给了刘大壮。这个阅历深广、饱经沧桑的老兵，看到这精致的荷包时，惊喜得不知说什么好。顿时，这件珍贵的礼物，就成为了他们全班的财富，被弟兄们那一双双粗糙的大手争相传阅着，最后又越出了他们班里的范围，在全连的弟兄们中间传看了好长一段时间。刘大壮深恐别人损坏弄脏了那件珍贵的礼物，一再叮嘱。陈欢仔第一次见到

班长对自己的东西这样珍贵，笑着向他问道：

“班长，你还从来没有这样小气过。难道里边装的都是珍珠宝贝啊？”

“这可比珍珠宝贝还贵重！”刘大壮十分认真地说道，“珍珠宝贝拿钱还能买得到，可这个是拿钱买不到的。”

是啊，刘大壮的话说得多好。现在，当万先廷看着大凤在荷包里藏着的这一绺头发时，他深深感到，这是一个少女的纯真的心。万先廷知道：大凤是在他们那一带山乡里第一个剪去辫子，留起短发的少女；她的这一绺头发，不仅表示着他们坚贞不渝的爱情，而且还表示出在革命的路上和他共同奋斗到底的决心。在离别的那一瞬间，她闪着晶莹的泪光，默默地凝视着他，有多少叮咛和祝福都深藏在她的心灵里，难以用言语表达出来。现在，万先廷从她的这一绺头发上，完全懂得了她想要说出来的千言万语，感受到了她希望在遥远的征途上永远伴随着他的那颗美好真诚的心。

万先廷坐在那里正在想着，忽然听见勤务兵张小鹏的喊声：“连长！……”

万先廷抬头看去，只见张小鹏匆匆向他走过来，后面跟着营长的勤务兵于头。他知道一定是营部有什么重要军务，便急忙把荷包收拾好放进衣袋，一面站了起来。

于头总是那样乐乐呵呵，黑红的胖脸蛋总像喝醉了酒一样，这就使他那双总是微笑的、眯缝着眼睛显得更小。不过他的服装倒是比过去看着整洁了一些，不像以前总是像个油腻腻的厨子一样了。他走到万先廷跟前，很利索地敬了个礼，用他那有点卷舌头的山东土腔说道：“六连长，营长请你马上到营部去一趟。”他把“长”说成“讲”，“请”说成“庆”，“上”说成“向”。

“好。”万先廷答应一声，便向张小鹏道：“你去报告连副，请他到伙役班检查一下，抓紧时间开饭。你们不要等我回来。”他知道营长在这个时候叫他去，准是有了什么重要的战斗任务；因为他们二营是全团的前卫，而进入湖北以后又完全是吴佩孚直接控制的地区了，沿途随时可能会遭遇北洋军的反击。因此当他随着于头向营部走去时，一面在心里暗想着，这进入湖北的第一仗，他一定要努力去争取让他们第六连来担负。

第二营营部就在分水岭上的那座“界上屋”里。那房子外面有一块不大的禾坪，大约是建造这房屋时主人从山崖上开辟出来的；这块禾坪的三面都被山崖包围着，那条官道就从禾坪中间通过。山崖上有几棵古老的大树，那茂密的枝叶垂挂到禾坪的上空，因此显得十分荫凉。大约因为这个地方是过往行人的必经之地，在禾坪旁边的山崖上修了一座用石头砌成的过路凉亭，四周宽厚的石栏杆便是很凉爽的座椅，已经不知被多少人坐得发黑发亮了。

天气格外炎热，同时也为着遵守“不扰民宅”的规定，因此营部的人员就都在这块禾坪上和凉亭的周围休息。营长樊金标坐在靠近那界上屋大门口的一张旧竹床上，正皱着眉头在看一张摊在竹床上的军用地图。场坪旁边还有几匹没卸鞍的战马，大约营长也是刚刚从团部回来。他光着头，大沿军帽和皮挎包都放在旁边。几天的山地行军，没工夫刮胡子，他那连鬓络腮胡又像钢刷一样长出来，显得又粗又硬。在这几天的行军生活中，于头背地里说，营长宿营下来后，忙完了队伍上的事，总要点着灯看好一会书。过去宿营下来，于头最紧要的任务是要为营长去买酒，而现在最紧要的是要为营长去借一盏玻璃罩子的洋油灯，并且尽量把那玻璃罩子擦得明光瓦亮，一尘不染。当他看见营长看那些书显得十分吃力时，他也感到格外着急，总怕是因为灯光不亮，营长看不清那些像苍蝇般的小字。于头虽然机灵得能认出每一头苍蝇的面孔，但对这些小字他却一点也无能为力。当别人问他，营长看的是些什么书时，他总是无可奉告地摇头，然后显得十分神秘地低声说道：

“还有曲曲弯弯的洋码字啦！营长有时候一个人还念念叨叨的，在外边听着就像他在跟别人说话似的。那书前头还有两个洋人的相片，都是大胡子，比咱们营长的可长得多。我想，咱们营长要是学好了，是不是胡子也该长这么长了啊！”

人们都被他的话逗得笑起来。于头仍然是十分认真的样子，他既自豪，又充满委屈地说道：“嘿，现在我可不能有一点错啦，营长动不动就拿那些书里的话克我一顿！有一回，他正在房子里看书，我悄悄走进去想给他倒碗水喝，他一听见响动就恼火起来，冲我大声嚷：‘你他娘要进来就好好进来，老是像个幽灵荡来荡去的干什么？’后来我才听说，幽灵就是鬼，您看我变成个鬼啦！”